

# 顺治时期浙江县志编修与地方秩序\*

——以处州府松阳、遂昌、龙泉、宣平四县为例

徐 鹏

**提 要：**以顺治时期浙江处州府4部县志为例，经过文本释读，阐释乱世修志背后纷繁复杂的修志群体与心态，并进一步讨论此期县志编修于地方秩序恢复的意义。文章旨在言明明清易代并未中断县志编修的传统，现实的无序反而为参与其中的人员提供了某些逾越规矩的可能；修志亦让各类资源聚集一处，共同致力于战后社会的恢复与重建，民心、风俗与生产也得益于此，进而逐渐形成对新的朝代和文化的认同。

**关键词：**顺治 处州府 县志编修 地方秩序

近年来，随着区域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地方志尤其是大量县志已成为学者们建构和解释历史过程的史料基础，不少学者敏锐地注意到文本背后的目的、动机、意图、观念及权力，并将其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加以解读，探讨地方志编修的经过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地方社会变迁与互动关系。<sup>①</sup>毫无疑问，上述研究确令人耳目一新，对笔者亦颇多启发。然作为地方社会各色人等利益博弈的场域，地方志编修本身就自带诸多可资探究的面向，加上区域史范围之广，广东、江西和山西等地的境况自然不可等同于浙江，且浙江诸府又各有异趣。因而，本文撷取顺治朝处州府的4部县志作为研究对象<sup>②</sup>，除却这一时期具有的特殊性外，4部志书在两年中由一人所纂，后又散佚或流失海外，着实让人欲一探究竟。其间，是朝代更迭、政治失序（political disorder）给地方社会的种种新行为提供了可能，还是历史的机缘巧合？为此，笔者意在通过对4部志书的文本释读，以窥乱世中处州府的各级官绅们是如何看待和组织修志的，县志的编修又对新王朝的认同与地方秩序的重建有何裨益。

\* 本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海外浙江旧志收藏现况研究”（项目编号：15NDJC214YB）、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基地——专门史学研究成果之一。

① 详见〔日〕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纪の中国秩序问题》，东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陈蕴茜、曲兵：《论清末民初士绅与江浙地方志的变化》，《江海学刊》2004年第4期；谢宏维：《文本与权力：清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地方志分析》，《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美〕戴思哲：《谈明万历〈新昌县志〉编纂者的私人目的》，《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0年；陈春声：《从“倭乱”到“海迁”：明末清初的区域社会史解释》，《学术月刊》2010年第7期；冯玉荣：《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7期；李晓方：《县志编纂与地方社会：明清〈瑞金县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张继莹：《只恐遗珠负九渊：明清易代与〈偏关志〉书写》，《明代研究》第27期，2016年12月；曾伟：《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以浑源州为例》，《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2期。

② 顺治朝松阳、遂昌、龙泉、宣平四邑所修县志，现存3部。为叙述之便，文中所指4部实指松阳、龙泉、宣平三志（亦非全帙），加之《遂昌县志》仅存的部分序跋。

## 一 顺治时期浙江县志编修概况

明清两代是浙江旧志编纂最为鼎盛时期，各级各类志书不可计数，其间亦有因战乱、灾疫或者国家政令的实施，而呈现一定的阶段性，如鼎革之际，兵燹频仍、社会动荡，浙江一域付梓的县志就寥寥可数。应当指出的是，顺治三年（1646），清军大举入浙后，连续击败鲁王、唐王的势力，基本占据浙江，继而新朝便开始着手意识形态和地方秩序的重建。及时编修一部地方志书无论从稳固政权或是稳定社会而言无疑都是一剂良方，其自身具有的多重功能，也使这些新朝统治者对基层志书寄予了前所未有的期许与想象。

事实上，对上述现象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有学者指出，浙江各地“特别是顺治八年至十三年的五六年内，编出的县志有十三种之多。此期志书的编纂，在地区分布上有着明显的特征，即受战争影响十分大。……由于温州、台州战争连绵不绝，宁波亦常受到张煌言军的攻击，故志书编纂均在内地。……以杭州、处州编纂的志书为多”<sup>①</sup>。这一说法大体不错，但细究之下，则并不尽然。其一，顺治八年至十三年（1651—1656）间，浙江编出县志有据可查的，应是9种（详见表1），而非13种；其二，据《浙江方志考》，顺治时期县志编纂最多的是处州府，为4种，其次是金华府3种，衢州府2种，而杭州府的县志仅《海宁县志略》1种，且未成书；其三，此期志书的编纂，虽在地区分布上受到海上抗清势力的影响，却也应注意到除台州外其他各府亦纂修过至少1种县志的事实。除此之外，在当时的形势下，浙江还修出了4部府志。<sup>②</sup> 尽管这些志书无一不着上乱世的痕迹，如卷帙少、错漏多、散佚早，甚至是未刊行或修了一半，然于战乱中成志已属不易，更何况处州府四邑共付割削，殊为难得。

表1 顺治时期浙江各府所纂县志一览

序号	志名	所属府	卷数	纂修时间	收藏现况
1	《武义县志》	金华府	10卷	顺治三年修	未见传本
2	《长兴县志》	湖州府	10卷	顺治六年 (1649)修	上海图书馆藏
3	《平阳县志》	温州府	8卷	顺治八年修	今人朱偁藏
4	《开化县志》	衢州府	10卷	顺治九年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5	《金华县志》	金华府	10卷	顺治十一年修，十二年刊	日本内阁文库藏
6	《武义县志》	金华府	10卷	顺治十一年修	未见传本

① 魏桥、王志邦等：《浙江方志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4—145页。

② 分别是《嘉兴郡记》（顺治六年）、《湖州府志前编》（顺治六年）、《严州府志补遗》（顺治六年）以及《处州府志》（顺治七年〈1650〉）。

(续表)

序号	志名	所属府	卷数	纂修时间	收藏现况
7	《松阳县志》	处州府	10 卷	顺治十一年修	南京图书馆藏, 日本内阁文库有原刊本
8	《遂昌县志》	处州府	10 卷	顺治十一年修	未见传本
9	《龙泉县志》	处州府	10 卷	顺治十二年修	北京大学图书馆(残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10	《宣平县志》	处州府	10 卷	顺治十二年修	日本内阁文库、(日本)天理图书馆藏
11	《海宁县志略》	杭州府	/	顺治十三年修	未成书
12	《新修淳安县志》	严州府	6 卷	顺治十五年修	上海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缺卷4)藏
13	《重修奉化县志》	宁波府	16 卷 首 1 卷	顺治十六年修, 十八年刊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4	《常山县志》	衢州府	15 卷	顺治十七年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5	《桐乡邑乘》	嘉兴府	/	/	未刊已佚
16	《诸暨县志》	绍兴府	/	/	稿成未刊, 已佚

## 二 组织与编纂：处州府 4 部县志

处州府下辖十邑, 相当于今丽水市, 位于浙江西南部, 境内山脉众多、水源丰沛, 因地处内陆, 旧时交通多有不便。松阳、遂昌、龙泉、宣平在地域上次第相连, 除龙泉地属西南外, 其余三县均处于处州西北部。

明末清初, 处州曾三修府志, 一是崇祯八年(1635)知府朱葵主持纂修的《处州府志》, 18卷, 现有存本; 二是顺治初年, “推官张元枢续修, 始崇祯八年, 止顺治七年, 附于旧志之后”<sup>①</sup>, 未见传本; 三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知府刘廷玑主持纂修的《处州府志》, 12卷, 有传钞本。其中康熙志恰逢盛世应诏而纂, 前两部则都在衰离乱世中编就。一般而言, 古代县志多源于省志、府志层层檄修的需要。按此, 这股集中在顺治十一年(1654)至十二年间的县志编修风潮, 当不属于府志编纂之需。然细稽群籍可知, 在顺治七年, 王崇铭任处州府知府后, 曾有意再度续修府志。据《前邑令卧齐赵公遂昌县志旧序》载: “是志乃有成也, 实系郡伯心盘王公以异才刺括苍, 飭蛊厘新、百废具举, 于万冗中首重志典, 既偕前司李紫垣张公续修郡乘矣, 复

<sup>①</sup> 李卫、嵇曾筠等修, 沈翼机、傅王露等纂: 雍正《浙江通志》卷 253, 中华书局, 2001 年标点本, 第 13 册, 第 7053 页。

檄十邑共举坠绪。”<sup>①</sup>可见，4部县志确应府志而修。

顺治十年（1653），“莅括三载”的知府王崇铭命十邑诸令开修县志，松阳知县佟庆年“首慨然倡行之，礼贤选能，鸠工庀材”<sup>②</sup>，延请胡世定主纂其事。其后，遂昌、龙泉、宣平志局继启，全由胡氏一力承当。4部县志除遂昌已佚外，其余3部均被较好保存了下来，分藏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或文库，为本文提供了相对完整的研究文本。

顺治《松阳县志》：佟庆年修，胡世定纂。笔者所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据南京图书馆藏刻本影印，缺王序、佟序，文字日久漫漶。顺治十一年修，“凡八阅月始竣工”，为松阳现存最早县志。志前有序、凡例、修志姓氏、目录，分舆地、经制、食货、秩官、选举、人物、堙祀、艺文、兵戎、杂志10纲，下设53目。《松阳县志》最早见于元代，明代曾两度修志，俱佚，因此顺治志在体例门类上有无创新，已无可考，然从现有纲目来看，应是基本承袭了明代志书的既定框架和记事范畴。

顺治《遂昌县志》：徐治国修，胡世定纂。《浙江方志考》误记为吴世定纂。未见刊本，雍正《浙江通志》卷253有著录。顺治十一年修，“八阅月而始成”。《遂昌县志》最早见于明代，凡四修，俱佚，仅康熙《遂昌县志》存隆庆志序二，崇禎志序二，顺治志一序四。

顺治《龙泉县志》：徐可先修，胡世定纂。《浙江方志考》误记为胡世定、傅梦吁纂，后诸家方志目录多因袭沿用之，然傅梦吁乃浙江按察使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参议、分守温处道，实不可能任主纂一职。是志顺治十二年（1655）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残本<sup>③</sup>，日本内阁文库本相对完整，但内文有缺页，志前仅存一序及凡例、目录、修志姓氏（部分），分舆地、建置、官师、食货、选举、人物、艺文、堙祀、兵戎、杂志10纲，下设91目。《龙泉县志》最早见于南宋，明代凡三修，俱佚，顺治志是龙泉现存最早县志。

顺治《宣平县志》：侯杲修，胡世定纂。顺治十二年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误记为顺治十三年（1656）修。是志流失日本，国内仅缩微胶卷和中国数字方志库可查阅。志前有序、目录、修志姓氏，缺凡例，部分文字漫漶难辨，分舆地、建置、官师、食货、选举、人物、艺文、堙祀、兵戎、杂事志10纲，下设68目。《宣平县志》最早见于明代，凡三修，存嘉靖志。

揆度以上记述，4部县志在编修时间、体例内容、存藏现况、历史价值等方面，都呈现出极为相似的一面，其中尤为注目的是纂修一职。爬梳两地史料，常州府的各级志书中并无胡世定的相关记载，处州府也仅4部县志的序言及散落志中的几首诗词，透出少许信息：胡世定，江苏荆溪（今宜兴）人，号荆溪，又号秋水伊人、荆溪伊人。据现有资料推测，胡氏在功名上可能并无多获，为生计奔波于江浙，以修志为业。当然，亦有另一种可能，即鼎革之际，人才凋敝，顺势而为的胡世定被新政权招入幕下，成为新朝南方大员们开疆拓土的左膀右臂。无论如何，这种高度集中的修志模式，为4部县志的如期梓行提供切实保障，则是殆无疑义了。

① 康熙《遂昌县志》卷首《旧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68册，第19页。

② 民国《松阳县志》卷首《旧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7册，第165页。

③ 《浙江方志考》载顺治《龙泉县志》：“顺治十二年修，刊本，四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支部内阁文库收藏。上图有胶卷复制顺治十二年刻本。”即该志国内已佚，只有海外孤本。然笔者在2013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中发现亦有顺治十二年刊本，将之与日本内阁文库本比对后，发现北大本残缺较严重，少部分可与日本内阁文库本互补。

### 三 合作与博弈：志局中的百态众生

古代官修志书的编纂需要多方协作和各级配合，涉及地方与中央、个人与群体的互动乃至博弈。明清时期的县志多在志前置修志姓氏，详细罗列上至知府、知县，下至督工、梓人的姓名。这份名单和县志序跋为我们透视修志人员的构成及心态提供了最直接的史料。

表2 顺治时期松阳、龙泉、宣平三县县志编修人员名单<sup>①</sup>

志书	人数	任职	身份	姓名	籍贯
《松阳县志》	23	督修	守温处道布政司参议	傅梦吁	关东
			处州府知府	王崇铭	阳城
			处州府同知	刘进礼	锦州
			处州府通判	彭应震	灵宝
			处州府推官	赵霖吉	睢州
		主修	松阳县知县	佟庆年	辽东
		协修	儒学署教谕事举人	凌元鼎	会稽
			儒学署教谕事训导	孟称舜	会稽
		纂修	/	胡世定	荆溪
		校修	儒学生员	丁涵等 9 人	不详
			督工吏	周一德等 3 人	不详
梓人	胡大英、王兆		不详		
《龙泉县志》 (缺页)	31	主修	龙泉县知县	徐可先	武进
		协修	教谕举人	施春锦	开化
			训导贡生	李文征	长兴
		纂修	/	胡世定	荆溪
		校修	/	熊开世等 21 人	不详
督梓吏书	叶弘俊等 5 人		不详		
梓人	朱□□		不详		
《宣平县志》	40	督修	分守温处道副使兼右参议	傅梦吁	关东
			处州府知府	王崇铭	阳城
			处州府同知	刘进礼	锦州
			处州府通判	彭应震	灵宝
			处州府推官	赵霖吉	睢州
		主修	宣平县知县	侯杲	无锡

<sup>①</sup> 因顺治《遂昌县志》已佚，修志姓氏后志无存留。

(续表)

志书	人数	任职	身份	姓名	籍贯
《宣平县志》	40	纂修	/	胡世定	荆溪
		校修	/	郑有哲等 19 人	不详
			监理善士	郑如春等 6 人	不详
			监梓吏书	郑廷楨等 8 人	不详

由表 2 不难发现, 3 部县志的编修都有着明确的分工, 从督修的上级官员、主修(协修)的地方官员到纂修的邑外文入、校修的儒学生员以及吏书善士、督工梓人等。首先, 以官员来看, 一类来自帝国的龙兴之地,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从那里出来的官员, 对清王朝更有认同感, 也更容易被清朝统治者委以重任, 派往各地担任地方军政首脑。”<sup>①</sup> 他们是县志的主导。另一类源于北方或江南地区, 多为归化或是在顺治朝考取功名的士人, 是县志的主体。其次, 就主纂而言, 其于一部志书的发凡起例、考设篇章、斟酌总核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多由地方上的宿儒耆绅担任。但事实上, 延请邑外有经验人士修志的做法亦不在少数, 清代尤为盛行, 乾嘉时期还出现过许多为他邑修出名志的方志学家, 如章学诚、戴震、洪亮吉等。不可否认, 清初的这种情况并非是出于志乘品质或攀附名流的考量, 一支可控且与地方势力毫无纠葛的“他者”之笔, 会让新朝的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在县志中得以确立。最后一部分是社会层次较低的地方士绅, 究其原因, 一方面与县志编修期间当地的科举仕宦状况有关, 新朝初定又地处“东浙最僻境”, 四县科名不振自在情理之中; 另一方面, 儒学生员也确是被组织参与县志的参核、校审, 以表明“郡邑之公论出学校”。

不难看出, 细密的安排与高度的集中, 处处体现出中央政府欲加强对地方社会控制的意图, 然而有意思的是, 在国家权利尚未深入的情况下, 修志人员对于县志编修的反应和态度微妙而隐晦, 折射出各自不同的诉求与目的。

1. 督修: 首重志典, 共举坠绪。遍览四志, 督修官员虽不在少数, 但真正行其之实的是知府王崇铭。据乾隆《阳城县志》载: “王崇铭, 明时举人, 国朝知永年县, 提户部主事, 历郎中, 出知处州府。”<sup>②</sup> 前朝举人和新朝仕宦的多重经历使王氏深谙修志之要义。为此, 王崇铭力克时艰、苦心孤诣, 不仅为四志亲撰志序, 而且将主纂事宜交由一人统摄, 试图通过“首重志典”, 重整地方尤其是士绅阶层在价值取向和利益抉择上的混乱与失序。

诚然, 要在“山寇未靖, 兼有水患, 田芜不治, 十邑皆然”<sup>③</sup> 的困境中, 通过志书的编修将国家权力与意志渗透到地方绝非易事。顺治十一年, 王崇铭在《松阳志序》中如是记录了倡修县志的缘由:

有一书而为千秋之袞钺, 数言而关百代之兴衰者, 郡邑之志乘是也。自春秋之义隐, 南董之笔绝, 尊月旦者成一家言, 务标榜者为一时尚, 乌足以定信芳而甄菽稷哉? 况人心与时升降, 世俗与道变迁, 又不可以意臧否上下古今也。余莅括三载, 幸无过举, 获与十邑诸贤

① 曾伟:《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以浑源州为例》,《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2期。

② 杨善庆修, 田懋纂:乾隆《阳城县志》卷9,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中国数字方志库。

③ 曹抡彬:《雍正旧志序》,光绪《处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3册,第4页。

共事。兹土靖烽壑而崇文岫，一时治化文风，咸率然丕变。爰取十邑书而考核之，可以兴，可以观，一时口碑，千秋人镜，借以鼓励人心，兴起教化者，端有是赖而乌可以旦夕缓？因进诸令而亟商之。<sup>①</sup>

缕析上文可以看出，由于郡邑志乘有关千秋百代的衮钺兴衰，所以随着世易时移和人心世俗的变迁，是非曲直需要新的评判体系中定义与甄别。同时，邑乘的编纂可以“鼓励人心，兴起教化”，是新朝定鼎后不可旦夕缓之要事。概言之，作为清修的第一批县志，知府王崇铭希望在“靖烽壑”后，借由志书的纂修招徕贤士、归化人心，重新建构地方价值观念与道德评判体系，进而迅速恢复地方社会各方面秩序。遗憾的是，顺治十三年，王崇铭“以抚寇功晋福建运使”，这股修志热潮也就随着他的离任，悄然冷却。可见，清初政府层面的修志执行力度仍十分有限，仅靠地方官员个人意志的推进并未形成持续有效的修志传统。

2. 主修：承郡侯命，慨然其事。明清时期县志主修一般由知县担任，他们负责整个志局的运转，包括经费的募集与筹措，人员的选拔与配备以及志稿的监控与把关，等等。所以，厘清4位主修的身份经历与修志动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表3 顺治时期处州府四县县志主修情况一览

县名	县令	籍贯	功名	宦绩
松阳县	佟庆年	辽东	戊子贡士	于新朝为国戚，为元勋。幼有才胆，拓矢能作霹雳声，兼干略练达，族望群推之，故以少年荷筒选来松。下车，正值山寇窃发，倚险肆劫。公开诚招抚……群党解散，全邑获宁 <sup>②</sup>
遂昌县	徐治国	辽阳	戊子恩贡	武毅果敢。山寇不靖，闻警即奋勇扑剿，贼不敢近境。桑土绸缪，民得安堵 <sup>③</sup>
龙泉县	徐可先	武进	丁亥进士	下车设义勇，膳防兵，严保甲，民始复业。尤加意拊循，革宿弊，戢器卒，与之休息 <sup>④</sup>
宣平县	侯杲	无锡	己丑进士	令宣，律己以清，御下以严，捐赎银，除火耗，清山寇，戢强民 <sup>⑤</sup>

① 民国《松阳县志》卷首《旧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7册，第165页。

② 顺治《松阳县志》卷4《名宦》，“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7册，第64页。

③ 光绪《遂昌县志》卷6《职官》，“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8册，第430页。

④ 徐可先修，胡世定纂：顺治《龙泉县志》卷3，日本内阁文库影印本。

⑤ 侯杲修，胡世定纂：顺治《宣平县志》卷首，日本内阁文库本，中国数字方志库。

按表3所列情况来看,某些看似不经意的巧合或许进一步促成了这次特殊的县志编修。如佟庆年与徐治国均源于关外,同年贡士,又同在一府分治松、遂两邑,皆为新朝倚重之士,平定天下之材。巧得是,徐可先、侯杲二令也有同乡之谊,两人不仅出于常州望族,同为新朝进士,且在龙、宣施两邑的理政时间、方略亦颇相近。在中国传统的士人关系网络中,这种基于同乡、同年、同僚的情谊自是毋庸赘言。

所不同的是,四邑令虽承郡侯之命编修县志,但由于境况各异,其对新朝修志的认识亦殊。松阳县令佟庆年“慨然欲奋其事”的原因在于:“自明之隆庆刊后,八十余载未有修复,板帙残缺已成故纸。今天子购书,首先是问。各台莅任,必索以偕宪纲俱进。每进时,持檄呼嗥,寂无以应。民间之素称藏书者,兵余亦不能复得。”<sup>①</sup>因此,作为清廷贵戚、开国勋臣的佟庆年迅速意识到修志之于平寇抚民的意义。尽管其学衔、官位均不及知府王崇铭,但显赫的身份与功勋极有可能使之在倡修县志和主纂的安排上,起到关键性作用。

然相较于他邑的“烽鼓稍宁”,遂昌县令徐治国则没那么幸运。“明之末,靛寇即已滋种,延及于今,已十余载,日夕靡宁。余莅兹土凡三期,介马而驰,躬阅险阻以与周旋橐鞬,不啻数十次。无奈山川之崇沓与门户之杂处,兵至贼飏,兵归贼来,一剿一口,实逼他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sup>②</sup>据史料记载,大约从崇祯年间开始,浙南山区因为一批由闽汀移民组成的靛农起事而变得颇不安宁,明朝政府曾出兵镇压却收效甚微,迨至清初,仍未得到有效遏制。而不谙山战的徐治国,为此意伤神怆、分身乏术,在修志上只能紧随佟后,亦步亦趋。

徐可先和侯杲都是典型的江南士人,对于如何经营其先赋与自致的关系网络十分稔熟。加之二人分别在龙泉、宣平理政有六七年之久,两地“民俗丕变”,社会治安“渐次底定,虽深山巨藪,弄兵狐啸者,固所时有,亦迄不能为大患”<sup>③</sup>;宣平更因知县侯杲的请撤防兵,独“无兵扰之苦”。因此,较之于松、遂两志,龙、宣二志的两位主修不仅亲裁凡例,详记其任内的营建兴创、声名文教、诗赋文章,而且上邀官员作序题跋,下请儒生参核审校,共享县志书写的文化权力。<sup>④</sup>在此过程中,儒家士大夫立德、立功、立言以传不朽的人生理想也得以完美实现。

3. 纂修:志局继启,二载始竣。前文已述及主纂,知其大略。很巧,胡世定也来自常州府,如果说顺治十一年编就的松、遂二志,是因两邑令对儒家文化的不自信与掌控之便而不得不延请一位熟知修志流程的邑外人士担其重任的话,那么紧随其后的龙、宣二志,则是两邑令念及同乡、顾及同僚的结果。也因如此,一个名不见经传却懂得审时度势的他邑文人,于离乱中凭借经验偶成了4部县志。

当然,要在短时间内修出四志,洵非易事,况乎每位知县对志书又有着不同的私心与要求,因此“两载间,余以小舆奔命往返者,凡四五,今秋始告厥成”<sup>⑤</sup>。然胡世定亦无愧为一名专业的修志者,其在宣平志序中详述了4部县志的编纂始末:

① 佟庆年:《顺治佟序》,民国《松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7册,第166页。

② 徐治国:《邑令辅圣徐公修遂昌县志旧序》,康熙《遂昌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8册,第17页。

③ 徐可先:《原序》,光绪《龙泉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7册,第663页。

④ 笔者认为,在顺治时期处州府的4部县志编修中,为了确保志书的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的正确性,地方士绅并无实质上的书写权力,不过是新朝交好和笼络的手段而已。

⑤ 胡世定:《增修遂昌县志旧序》,康熙《遂昌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8册,第18页。

余不敏，承志役凡三，于宣且四矣。松志自隆庆以迄于今，板泐败无存，搜取只得二三事已而，修之为时颇多而颇艰。遂幸存板，乃简其目为七，又以天时、地利、人和分其修，贯天时有几何而以什之一与什之三与七者，侔也。龙志为稍正，但于所当载与不当载亦有遗漏与浮溢。三邑之殚精瘁神者，松为最，遂次之，龙又次之，今宣之局又一变。宣志于修甚近，丙子迄今仅二十期耳，而事则多未备。<sup>①</sup>

这番自谦又恰如其分的圆融之辞，不只道出了四志续修的先后与难易，且透露出此次修志并非全因志板无存，而是易代后，拿旧志献新朝，实为不当。

明清时期，入载县志对所有官绅都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地方官员在志中“自述其绩”已成惯例，清醒如胡世定者，既主纂四志，便隐列自己所写山水、咏物诗于舆地志山川、古迹条目下，其目的自然是消解邑人对其僭越入志的指责。

4. 协修与校修。县志的协修一般由地方学官担任，他们因承担着移风易俗和兴学教化之职继而成为志局的当然成员。县学的教谕与训导多为举人、贡生出身的饱学之士，如松阳训导孟称舜即为当时著名的戏曲作家和理论家。尽管他们有着组织儒学生员参与修志之便，又是县志记事出于公论的表征，但正因为这种敏感的身份加之孤傲的品性<sup>②</sup>，决定了其在清初县志编修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受到限制。

相对于主修、主纂等掌握县志实际话语权的“他者”，儒学生员是真正的地方人士，他们比谁都清楚新旧交替给地方社会带来的隐痛。然而异族王朝初定，这个由官、兵、民、盗交织成的共生体，处处充斥着猜忌与不安。“士人群体对于地方社会的治理和秩序建构意义重大，他们可能是一场冲突的制造者，也可能是另一场冲突的调节者。”<sup>③</sup>因此，这股精英势力是新朝统治者既想拉拢又有所忌惮的对象，给予其校修一职，实则亦是彼此互相试探和利用的一种方式。

#### 四 变乱与重建：县志编修于地方秩序恢复的意义

明清嬗代之际，处州府虽较之浙北与沿海地区稍显安稳，但政权更迭、盗贼蜂起、灾害频仍、物价飞涨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饥馑，使得社会同样处于无序的状态。而这种从明末开始即弥漫于当地的恐慌情绪，使得官员们不仅要致力于社会整体秩序的维护，更需要取得地方士绅与百姓对新朝安邦治国平天下的认同，如何在变乱中重建家国意识，重整地方秩序，就成了当务之急。顺治十年（1653），四县境内除遂昌外“兵戈暂靖”，影响社会秩序的更多是地方内部的治乱问题。编修县志作为地方上受人关注的文化大事，对转移矛盾、凝聚民心，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sup>④</sup> 检阅4部县志可以发现，围绕着新帝国的建立，书写的权利被高度集中在可被信任的人手中，以保证地方与中央的一致，统一思想，重塑秩序。那么，县志的编修究竟在哪些方面对当

① 胡世定：《序》，顺治《宣平县志》卷首，日本内阁文库本，中国数字方志库。

② 顺治《松阳县志》在名宦中载孟称舜“品方正孤介，不肯与俗伍，不肯以私阿，力以励风俗、兴教化为己任”，且孟氏在年轻时曾参加过复社。

③ 冯玉荣：《明末清初松江士人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④ 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中论及1697年开博学鸿儒科考试，邀请中试者参加《明史》的编纂，乃使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员们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事实上，清初县志的编修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地秩序的恢复起到作用呢？

其一，有助于赢取民心，上抚士绅，下安百姓。

明清时期，待县志启动后，邑令往往要“爱迓贤轨，集绅士，登父老而榷谏之”<sup>①</sup>，旨在交好士绅耆老，以便在经费、人力和舆论上获得他们的支持与肯定，但清初地方官员的这一举动或许蕴含了更多的深意。在动乱时期，地方士绅出来维护一方安全的现象并非个别，如明末山西于成龙筑堡“千家保聚”，而“括郡群山叠峙，界于闽越，土著与异籍错杂。兵防其最急者，昔惟郡置协、各邑屯一二十戍卒而已。是以烽烟数起，控制维艰”<sup>②</sup>。如此情况下，“无论是农民军还是清军，与这些地方士绅的关系是合作还是敌对就变得十分重要了”<sup>③</sup>。知县借助修志，在长达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与众分勤，亦与众分荣”，使绅士父老对“明”与“清”的界限模糊在了重塑乡梓秩序与文化的焦虑和关怀上。

此外，在修志、读志的过程中，新朝官员们也能进一步了解地情、民情，“上布皇仁，下达民隐”。如鼎革初期，清军粮饷仰赖地方的补给，顺治《龙泉县志》载“邑有秋米，旧以溪谷险阻征解折色，年来兵兴需饷，抚征本色，民堪苦之，侯力申复旧折”<sup>④</sup>。县令徐可先体恤百姓的做法不仅赢得了民心也解决了军粮问题。类似记录在其余县志中亦有不少，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传统理想不断被提及、演绎和流传，显示出新朝迅速恢复地方秩序的能力与信心。

其二，有助于移风易俗，上兴文教，下革宿弊。

明清的鼎革易代，造成了士大夫们普遍认为风俗是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直接关系到国家、天下的命运，所谓“正风辨俗，古为治乱大要也”<sup>⑤</sup>。其时，四县“儒术稍衰”“俗尚机鬼巫”，停丧、溺女、锢婢三大宿弊一直为人诟病，政府定律禁止，收效甚微。而经由县志的编修，把硬性的律令化为柔性的训诫、乡约、箴言，用更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刻于亭石、祠堂，所及甚广。

“政有似缓而实不容不急者，今日之学校与声名文教也。”<sup>⑥</sup>实际上，县志编修本身即是兴文教的表现，其过程中无论是教谕、训导、儒学生员的参与，还是对书院、义塾、社学的记录与书写，都从更深层面反映出士绅阶层对社会变迁的看法及其自身心态的变化，亦是政府重视文教的有力佐证。还需注意的一点是，凡例中对人物入志的严格规定，“评隲各类俱有衰弃，独人物之品目，一遵《府志》，不敢别立品汇。凡有增入者，悉准口舆论采之，公评宁以严而见憎，断不滥而取消”<sup>⑦</sup>，“至新增者，俱月旦公确，始收入册，不敢阿徇”<sup>⑧</sup>。这种审慎定义的是新道德评判体系下的典范，如针对明末清初盛行于各地的烈女殉节，新朝的统治者显然更愿意看到的是仰事俯育、孝慈兼至的寡妇，而非弃一家老小于不顾的烈妇。因此我们发现，在才女文化并不兴盛的处州府，4部县志并未沿用传统的“列女”彰显一地的女教，而是设“闺操”宣扬更为有

① 徐治国：《邑令辅圣徐公修遂昌县志旧序》，康熙《遂昌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8册，第17页。

② 曹抡彬：《雍正旧志序》，光绪《处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3册，第4页。

③ 赵世瑜：《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④ 徐可先修，胡世定纂：顺治《龙泉县志》卷3，日本内阁文库影印本。

⑤ 顺治《松阳县志》卷1《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7册，第23页。

⑥ 佟庆年：《顺治佟序》，民国《松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67册，第166页。

⑦ 侯杲修，胡世定纂：顺治《宣平县志》卷首《凡例》，日本内阁文库本，中国数字方志库。

⑧ 徐可先修，胡世定纂：顺治《龙泉县志》卷1，日本内阁文库影印本。

利于秩序重建的女性美德。

其三，有助于恢复生产，上进赋贡，下复营建。

“邑自程煌之乱，屡罹兵燹，人民遁徙，所见败郭颓山，炊烟数缕而已。”<sup>①</sup> 战后的颓败与萧瑟是留给地方官员最大的难题，只有招徕人丁，新垦田亩，才能重兴农事，万象更新。而四邑修志，即在于昭告离人可以返乡，重整家园。美国史学家魏斐德认为，清初的改革，特别是赋税制度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使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 17 世纪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sup>②</sup> 这一研判在 4 部县志的编修中亦可见斑豹，如食货志详记当地的户口、土田、物产、矿冶以及税粮、额征等以备查征，顺治《宣平县志》还收录了《新颁赋役全书》，将新朝赋税改革的细则告知于民；又如《风俗志》附以《田家五行》的“占候杂占之大略，于分野气候之后，任斯责者或有取焉。则凡所以备旱潦，御凶荒，捍寇盗，趋吉而避凶者，无一之不至焉”<sup>③</sup>。明清志书中的风俗一门除了一般性的衣食住行、岁时礼节外，常记有气候、风信、潮汐、占验等项，因为这些内容关乎农业社会的人伦生息、生产作业以及政事运作<sup>④</sup>，有助于战后百姓趋利避害，更好的恢复生产生活。《建置志》是对县域内公共空间和设施存毁情况最全面和权威的记录资料，它们的盛衰兴废昭示了一地的繁荣与败落，也喻示着一地的风尚与文化。在频繁的战乱一次次动摇地方秩序后，县志的编修会给这些亭塔祠庙、桥路塘堰带来重生的机会。为了将自己的善举载入志书，明清时期的江南官绅们或捐俸或募资或倡导，直至完成上述工程的修缮或重建。

## 结 论

明清易代，社会动荡，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常显得并不强大而有效，因此顺治一朝，浙江地区编修的县志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和清代其他时期都无法相比。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才让我们得以看见，一人二载纂四志的非常景象及其背后纷繁复杂的修志群体与心态。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时代的必然。

进一步说，以处州府 4 部县志为个案的研究也表明，乱世中的编修县志并非如我们原先所想的那般逼仄和窘迫，现实的无序反而为编修人员逾规越矩的新行为提供了某些可能，他们借由各自的身份，或迎合圣意，或彰显功绩，或青史留名，或经营关系，在重构国家认同和重塑地方秩序的宏大叙事下，积累和攫取了个人的政治与文化资本。不仅如此，变乱时期的县志编修亦使地方上的各类人士和资源聚集在一起，共同致力于战后社会的重建，民心、风俗与生产也因得益于此，进而逐渐形成对新的民族、王朝和文化的认同。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光绪《龙泉县志》卷 8《政绩》，“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 67 册，第 760 页。

② 参见 [美]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增订本），新星出版社，2017 年，第 676 页。

③ 徐可先修，胡世定纂：顺治《龙泉县志》卷 1，日本内阁文库影印本。

④ 参见洪健荣：《清修台湾方志“风俗”门类的理论基础及论述取向》，（台湾）《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 32 期，2000 年。